

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因此 2015 年不应仅仅是中俄联合纪念这 70 周年,而是所有参与缔造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该来一起纪念,在历史的长河中审视

现在、展望未来,从而共享国际权力、共担国际责任、共护国际正义。○

从历史维度认识国际秩序的演进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当今的国际秩序图景是历史上不同秩序形态层累的结果。历史上,世界各个文明相互连贯且自成一体的地区,往往都以核心文明国家为中心,构造出自身与周边地区的地域秩序。

在近 500 年来世界历史从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的进程中,各大地区性秩序都经历过嬗变。西方国家内部的地区国际秩序最初只局限于西欧,后来逐步扩展到北美。秩序主导者的接力棒在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之间相互交接,几乎每次交接都经历过战争,这些战争即所谓西方世界的内战,一般都围绕宗教、意识形态、王位继承、殖民地、势力范围、霸权转移等进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中的主权平等原则,其实主要是指西方国家内部之间主权是平等的,是为等序格局,但一旦延伸到西方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则又构造出以不平等条约体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直到二次大战以后,随着非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才从形式上确立了以联合国主权平等原则为核心的等序国际秩序。西方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分别构造了一个在价值上与外部世界对立、经济上以中心和外围为特征、安全上以结盟和对抗表现出来的内外秩序图景。

近代以来,未受重视或遭忽视的是伊斯兰世界、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国际秩序,以及二战后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追求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动力。伊斯兰世界、俄罗斯以及中国在处理国际秩序问题上有几个共同点。第一,这三个地带都曾经构造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地区秩序;第二,其历史秩序在西欧(后来的美国)暴力扩张下中断了;第三,这三个地带加上二战后其他新兴独立国家的革命运动,共同塑造了战后国际秩序版图;第四,这三个地带远未被纳入

西方秩序的范围;第五,这三个地带与西方关系表现过或表现出参与和退出、观望和徘徊、独立自主、或者再成一体的复杂动机和行为,都有过通过革命摆脱西方的历史经验。总的来说,这三个地带在国际秩序认识上表现出复杂的一面,它们在对待与自身历史秩序、外部的西方秩序、自身的当代定位以及未来国际秩序设想上几乎都有过或者正处于矛盾心理。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在追求地区性秩序上分别出现了埃及、土耳其和伊朗等不同的道路,它们或者融入西方,从希望到失望再到退出,例如伊朗;或者是犹豫与徘徊,例如土耳其。俄罗斯也一样。在西方文明教科书中,俄罗斯和东欧长期被视为野蛮地带,这种认识至今也没有根本变化。近代以来,俄罗斯在与西方打交道时,也处于希望、失望、退出、自成一体的矛盾心理和行为中,经历了学西方又与西方若即若离的关系状态。苏联时期更是另起炉灶,构建了世界社会主义秩序阵营。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一度对西方抱有幻想,试图融入其中,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则实行与西方有限接触的外交政策。中国近代以来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体也经过了类似历程:中国有自己组织大地域秩序的历史经验和知识,历史上曾经形成过与周边国家共生的地域秩序,但这个秩序在西方暴力扩张下被破坏了,并被纳入西方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中国以武装革命、独立建国方式摆脱了西方的不平等条约体系,重挫了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秩序吸纳战略;中国是非西方世界最早走出冷战思维、走独立自主建设国家和发展外部关系道路的大国;中国有自己鲜明的国际秩序主张。

观察当今国际秩序变化,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值得重视。第一,如果有力量转移的话,其实在西

方世界内部也出现力量转移问题,也即美国的相对衰落与德国的上升。当我们看西方秩序的时候,最好不要将其视为铁板一块,其内部也有矛盾和力量中心转移问题。第二,新一波政治觉醒运动正在兴起,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以自己为中心构造全球性秩序,美国也做不到;同时,地区一体化运动正在改造着世界政区,欧盟、东盟、非盟、拉共体、欧亚联盟等地区级政区试验品不断出现,其背后是地区政治力量的觉醒。世界会逐步出现并真正迎来一个多极化格局。第三,地区秩序的构造离不开价值理念和经济力量两个因素。一个国家要想在地区秩序构造中扮演引领角色,经济力量必不可少,但还必须理想秩序的核心价值元素。苏联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大国,与其一度拥有社会主义价值资源有很大关系。俄罗斯现在提出振兴战略,但其要重新成为世界性大国还缺少或没有提炼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价值符号;欧盟在成为世界一极的过程中则大打“规范性

力量”这张牌。美国一度扛起“自由”、“民主”大旗,构造所谓“自由世界”秩序,但是美国干涉主义的不自由、不民主行为,使其所谓的“软实力”迅速流失。换句话说,美国的软实力可能根本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有很多泡沫。

回看中国与国际秩序问题,中国从来不缺组织世界的价值和理念也即道义力量,缺的是物质力量,但后者在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以来得到快速积蓄。中国在国际上一直扮演“和平国家”形象,提出许多以“和”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例如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等。当今世界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各种秩序方案层出不穷。2015 年是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可以预见,纪念大会将是各国首脑阐述国际秩序问题的一个重要契机和场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东方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应当利用这个契机和场合,系统阐述中国以和平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引领世界沿着正确的历史和秩序轨道发展。○

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转型

李永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权力转移”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 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提出的概念和理论,该理论试图探究和解释国际关系中“新来者”挑战“现有领导者”从而导致“权力从一群国家向另一群国家的转移”,进而引起国际秩序变革的历史现象。抛开围绕这一理论的长期争论及其本身的修正和发展,借用这一概念并结合国际关系的新发展,探讨当今世界“权力转移”与“秩序转型”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理论强调权力的转移指权力从一国或一群国家向另一国或另一群国家转移,比如二战后,美国 and 苏联取代欧洲列强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当今世界的权力关系变化则越来越呈现出非线性的多点与多向分散的特点。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全球领导

力下降、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上升趋势日益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世界主导权将简单地从美国转向中国。同样,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也不等同于其将取代原有的传统大国集团。未来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群雄并起又群龙无首的世界,尽管美国和中国也许会处于更突出的地位。事实上,对于当今世界这一现象,人们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无极世界”和“零国集团”(G0)等等。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则称之为“无人主宰的世界”。这一权力分散的现实使当今世界更加复杂而不稳定,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当今世界,“权力转移”还日益表现出权力分享的特点。权力的分享不仅体现为权力在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转移,还表现为权力从国家向社会和公众转移。这是一个普遍参与的时代,布热津斯基称之为“全球政治觉醒”。他认为,这是历史上第